

Ezra F. Vogel, *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*.  
Cambridge: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2011. xxiv+886pp.

Maurice Meisner, *The Deng Xiaoping Era: An Inquiry into the  
Fate of Chinese Socialism, 1978-1994*.  
New York: Hill and Wang, 1996. xiv+544pp.

### 陳耀煌\*

西方學界關於鄧小平的研究著作，不在少數。即使如此，前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主任傅高義(Ezra F. Vogel)教授於2011年出版的《鄧小平改變中國》一書，並未因此相形見绌。據作者所言，本書從醞釀到成書，長達十餘年之久。期間作者跑遍中國與世界各地，訪談過許多與鄧小平有過往來的中外名人，並翻閱與查考大量的著作與檔案。在中西方的學術界，以及報章雜誌與網路上，已有許多相關的評論與報導，由此可見作者與本書的知名度。既然如此，我們若只是撰文評駁該書的內容，也不過是錦上添花罷了。因此，本文擬將本書與邁斯納(Maurice Meisner)的《鄧小平時代》進行比較評論。為什麼要揀選一本十五年前出版的著作來對照呢？除了由於兩書處理的主題、年代重疊，更因為兩位作者的觀點與研究方法迥然相異。邁斯納的著作問題意識較明確，全書的主旨圍繞在中國官僚資本主義的形成及其帶來的負面影響；傅高義的著作則有史料上的優勢，這一點邁斯納不能望其項背，可惜顧此失彼，傅高

---

\*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助研究員

義的問題意識不如邁斯納鮮明，全書許多篇幅只是史實的陳述，不像邁斯納表現出甚強的理論性。又，邁斯納與傅高義年紀相當，兩者都是共產中國研究的前輩。邁斯納教授已於 2012 年 1 月過世，本文揀選他的著作來評介，也是希望藉此向這位已故的學者表達緬懷之意。

邁斯納是一位眾所皆知的左翼學者，他畢生尊崇民粹主義的觀點。用在共產中國的研究上，邁斯納主張，像中國這樣的落後國家，可以不必像正統馬克斯主義所規定般，一定要經過弊端叢生的資本主義階段，才可達到更符合人性與正義原則的社會主義境界。他以為在中共黨內，如早期的李大釗，以及後來的毛澤東，都是民粹主義革命的代表。所以邁斯納對毛澤東秉持較正面的看法，他認為毛雖然做了許多錯事，如大躍進，但毛的原意是好的。相反地，邁斯納批評劉少奇、鄧小平採取史達林的辦法，用國家的力量推動現代化建設，結果造成嚴重的官僚主義。毛發動大躍進與文化大革命，就是為了糾正此一官僚主義的錯誤。但邁斯納也承認，毛的嘗試失敗了，而且帶來更大的災難。在毛死後，鄧小平為了追求資本主義的現代化建設，完全摒棄社會主義的正義，恢復高度的官僚統治。所以邁斯納說，鄧小平的中國是一個不公不義的官僚資本主義社會。

與邁斯納完全相反，傅高義讚賞鄧小平，批評毛澤東。他形容鄧是在前線指揮戰事的總司令，關注實際的民生與經濟問題；毛則是坐在雲端上的君王，只會讀歷史、哲學與發布敕命。當毛推動反右時，鄧雖然沒有反對，但並不是打從心裡不喜歡知識分子。此外，作者曾訪問鄧的女兒，她表示鄧很後悔沒有阻止毛推動大躍進，但這恐怕只是作者與鄧的家人的後見之明而已。無論如何，作者非常欣賞鄧小平。他同情鄧及其家人在文革時的遭遇，批評毛越到晚年，越是狡猾邪惡。毛意圖培養王洪文等人取代日益受人民歡迎的周恩來，也要鄧小平公開承認文革是對的，以免在他死後，文革被翻案，自己的歷史地位也被改寫。但鄧沒有屈服，他在 1975 年以來，始終假毛的「三項指示為綱」，持續推動經濟的現代化改革，成為日後改革開放的先聲。毛對鄧不能公開承認

文革深感不安，所以在 1975 年底再發動批判鄧小平。不過毛此時已病入膏肓。隔年 1 月，周恩來過世；4 月 5 日，有群眾聚集在天安門前悼念周恩來，並喊出打倒四人幫以及反毛的口號，是為四五運動，作者據此指摘毛已經失去天命；毛最終於 9 月過世。

邁斯納對四五運動有不一樣的想法。在他眼中，四五運動有極高的地位，是社會與國家的對抗；但在傅高義的描述下，四五運動不過是高層政治派系鬥爭的反映，是激進派與改革派的對抗。從這一點即可看出兩本書論述角度的根本不同。邁斯納是從國家與社會二元對立的視角切入，傅高義則是把焦點集中在上層菁英政治，很少談到社會的反應。在交代完毛澤東時代後，傅高義花了二、三章的篇幅談華國鋒，一樣也是從上層派系政治的角度切入。在他看來，華國鋒也是改革派，因為後來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政策許多就是從華時代開始的。但是華的地位來自毛，所以他仍須高舉毛的口號，也必須承認文革的正確性，因為沒有文革，華也不可能當上中國的最高領導。可是鄧與葉劍英、李先念等老一輩革命者不能接受華的看法，因為他們許多是文革的受害者。以華和鄧為代表的凡是派與實踐派的爭執，實際上就是文革的既得利益者與受害者的鬥爭；後來鄧取代華的地位，也是此一派系鬥爭的結果。在鄧上台後，黨內派系鬥爭的焦點，又從凡是派與實踐派之爭，轉變為以鄧和陳雲為代表的改革派與保守派的鬥爭，後者不是反對改革，只是不贊同速度太快。整個 1980 年代的歷史，也就成了此一上層派系鬥爭的縮影。

邁斯納也承認中共高層內部充滿「拜占庭式的政治鬥爭」，但他更關注的是改革開放所帶來的社會問題。所以，與傅高義花了許多篇幅談上層的派系鬥爭不同，關於 1978 年前後的歷史，邁斯納更多地著墨在民主抗爭事件。他舉了傅月華和李一哲事件等許多例證，指摘鄧小平如何打壓民主。反觀傅高義的書在處理這些事件時，只是輕描淡寫地帶過，而且作者還試圖為鄧小平辯解，指出鄧對民主的打壓，與過去的毛時代比較，不過是小巫見大巫，且就整個鄧小平時代來說，中國民主的範圍是日益擴大的。可是邁斯納卻批評，鄧小平的

社會主義民主口號早就破產了，鄧是靠一個強大的官僚體制推動改革。邁斯納承認，自從毛時代以來，中國的官僚體制即日益膨脹，毛採取群眾運動的辦法予以抑制，並不成功；鄧也注意到此一問題，但他訴諸官僚體制內部的機制，予以合理化。這一點非常有趣。邁斯納與傅高義同樣都談到鄧時代官僚體制合理化的問題，但前者強調的是官僚體制反社會的面向，後者則是藉由官僚體制的合理化，來證明現代化改革的成效。

講到 1980 年代的歷史，兩者的焦點也不同。邁斯納說改革開放引進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，帶來了極大的社會問題。例如，生活在底層的農民與工人，因為集體化機制的消失，被迫面對不安定的競爭，以致農民大量地流入城市，工人也失去了鐵飯碗，成為雄厚的勞動後備軍，更方便少數官僚資本家的榨取，貧富分化也日趨嚴重。政府不僅沒有採取適當措置遏止此一趨勢，其錯誤的物價等政策，更導致通貨膨脹，惡化了情勢。官員涉入貪污腐敗的事件增多，又加深群眾的憤恨。這就為 1989 年天安門事件的爆發，預鋪了道路。

相反地，傅高義就很少談到改革開放帶來的社會問題，也沒有談到鄧小平與趙紫陽的孩子，同樣也涉入貪污腐敗的案件，而是用更多的篇幅來讚揚鄧小平的成就。例如，在外交上，傅高義說中蘇分裂肇因於四人幫的激進政策，如果中國早點讓鄧小平主持外交工作，中蘇不致分裂。隨後，作者花了兩章的篇幅，標舉鄧小平出訪日本與美國的成績，卻很少談到當時美國、日本內部有沒有反對中日、中美建交的聲浪；還說中美雙方不顧台灣人與美國國內保守派的反對，致力於攜手創造一個和平的世界，符合美國人與中國人的心聲，這與邁斯納強調美國國內反對的聲音完全相反。至於 1979 年的中越戰爭，邁斯納批評該戰役突顯了中國的大國沙文主義，可是傅高義卻同情地說，這是鄧小平為了抗議蘇越合作而發動的防禦性戰役。當然，後者也沒有像邁斯納般提到，當時西單民主牆上有諷刺中國入侵越南，是大人欺負小孩的大字報。

傅高義對社會問題的忽視，僅從章節安排上也可以看出來。他花了整整四章談 1978-1980 年的外交，又用了七章談鄧小平在政治、經濟、軍事，以及特

區方面的改革政策，還有台灣、西藏、香港的問題。中外交流與政治事件占了多數篇幅，而且這幾章的時限都在 1985 年以前，內容也是以談改革開放的正面貢獻居多。但是關於改革開放帶來的中國社會內部問題，以及 1985 到 1989 年間的歷史，作者卻分散在一、兩章的部份中談，不到一整章的篇幅。究竟作者在迴避什麼呢？

傅高義傾向講好的一面，與邁斯納對鄧小平時代的嚴厲批評，形成強烈的對比。如傅高義說，鄧小平用人的原則是選賢與能，像資本主義國家一樣，強調官員的工作效率，這就和邁斯納強調中國的官僚主義不同。傅高義還同情 1985 年前後因為貪污腐敗而遭到批判的廣東、福建省級領導，說他們是因為提倡改革開放，才被陳雲等保守派批判；可是，在邁斯納形容下，這些貪污腐敗的現象，正足以證明鄧小平時代的中國，是一個官僚資本主義與不公不義的社會。又如談到農村問題時，傅高義雖然承認包產到戶不是解決農村問題的萬靈丹，但他說如果讓農民就集體化與包產到戶作一抉擇，農民會壓倒性地選擇後者。邁斯納卻說，農村經濟的起飛，不是包產到戶的功勞，而是毛澤東時代集體化打下的基礎，有些集體化搞得較好的地方，農民甚至被迫接受包產到戶。邁斯納與韓丁(William Hinton)、徐維恩(Vivienne Shue)、伯恩斯坦(Thomas Bernstein)等左翼學者相同，遺憾毛的集體化被粗暴地污名化，並痛心改革開放給農村帶來更多的經濟、環境等問題，而不是解決問題。

雖然有如此多的不同，但傅高義與邁斯納都承認，鄧小平沒有放棄共產黨的一黨專政。不同的是，在傅高義的形容下，共產黨的專制統治因為改革開放的成功而獲得諒解。他說，蘇聯失敗了，就是因為放棄了黨的領導；中國之所以成功，也是因為鄧小平沒有放棄黨的專政，所以鄧曾對他兒子說，戈巴契夫是個白癡。邁斯納也承認，沒有黨的領導，改革開放不可能；但因為他更關注改革開放帶來的惡果，所以他也不能寬恕共產黨的專制統治。他說這是一個共產黨官僚與資本主義勢力合謀的官僚資本主義社會，是一個既不公平又不民主的社會；鄧小平背叛了毛澤東時代社會主義公平與民主的理念。

由於改革開放所帶來的不公平與不民主，加上政府錯誤的政策，導致 1980 年代後半物價高漲與失業等問題日益嚴重，終於引致 1989 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的爆發。在邁斯納看來，六四事件不是偶然的，而是一場國家與社會的對抗。在事件過程中，學生、工人與市民展現了大團結，堪比巴黎公社。與此相反，傅高義對於六四事件的背景，只是輕描淡寫地帶過，因為他更關注的是六四事件過程中，上層菁英人物對抗議者所欲採取不同政策而引起的矛盾。所以，傅高義對六四事件的評價，不如邁斯納那樣高。傅高義認為，學生不過是一盤散沙，而且學生事後也認為，挑戰中共是不智的，甚至還說中共的領導是中國富強的唯一出路。天安門事件雖然引起國際很大的憤慨，但這也是拜媒體宣傳所賜。傅高義還說，許多人認為鄧小平採取鎮壓的措施是正確的，因為至少六四事件後的二十年內，中國的經濟飛快成長。

但是在十多年前的邁斯納的眼中，天安門事件後，1990 年代初期中國經濟的快速成長，正足以證明鄧小平的中國是一個官僚資本主義的社會，中國不會因為當局鎮壓民主而停止發展。因為在鄧小平的中國，與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相伴而來的，原本就不是民主，而是高壓的官僚統治。邁斯納悲觀地預言，中國社會將變得愈益不公不義與不民主，反對共產黨專政的群眾抗爭也將日益增多，而且這些抗爭，邁斯納斷言，將採取更多的社會主義與民主的模式。此一論斷，也反映了作者的民粹主義色彩。

當然，傅高義完全不是這樣想。在傅高義看來，鄧小平既不是社會主義者，也不是極端的民族主義者。雖然鄧小平自幼就是個愛國分子，一直致力於追求中國的富強；但他在執政以後，並不想因為太強烈的民族主義而影響中國與西方的關係，因為後者是中國能否成功改革開放的關鍵。傅高義的說法，也呼應了當代中國官方的論述，即中國是一個和平崛起的大國。中國自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，採取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，變得愈來愈像西方國家。作者在談到鄧小平訪美時，曾借用一段媒體的評論說，鄧小平較不像共產黨，而更像「我們」（美國）。但是既然如作者所言，改革開放後的中國，從來沒有放棄共產

黨的一黨專政，僅就這一點來說，中國恐怕就與美國有本質上的不同。

總結地說，邁斯納與傅高義兩者都承認中國仍是一個共產黨一黨專政的國家，也都承認中國已走上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。不同的是，邁斯納不欣賞鄧小平，傅高義則是把鄧小平高高舉起。邁斯納的理論性較強，他著重的是傅高義忽略的中國內部與底層的問題；傅高義則有史料上的優勢，他挖掘了許多十多年前的邁斯納不會知道的史實，但也把自己侷限在史實的描述，特別是關於中國對外的關係與上層政治層面。史家的論述難免以偏概全，只有在比較不同視角的研究以後，我們才可以對一個歷史人物或事件，作出較客觀的評價。